

中華名人傳記



· 李鴻章 · 慈禧 · 梁啟超 · 張謇 · 秋瑾 · 梁漱溟 · 魯迅 · 石評梅 · 沈從文



中华名人传记

第六册

《中华名人传记》编委会·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名人传记. 第2卷 / 《中华名人传记》编委会主编.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80094-069-9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名人-列传-中国
IV. ①K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6315号

中华名人传记

编 著: 《中华名人传记》编委会主编

责任编辑: 冰 宏

总 策 划: 三读藏书馆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4700千字

印 张: 192.4375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995.00元

目 录

李鸿章	(2517)
第一章 一心走仕途的青少年时代	(2519)
第二章 投笔从戎——镇压农民起义	(2522)
第三章 “自强”、“自富”——投身洋务运动	(2533)
第四章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李鸿章的外交活动	(2556)
第五章 “山穷水尽疑无路”——晚年政治生涯	(2564)
慈 禧	(2571)
第一章 后宫逐鹿，生死搏斗	(2573)
第二章 辛酉政变，一次垂帘	(2583)
第三章 扫除政敌，二次垂帘	(2592)
第四章 无可奈何归政	(2603)
第五章 戊戌政变，三次垂帘	(2613)
第六章 被迫改革，寿终正寝	(2623)
梁启超	(2629)
第一章 少年时代	(2631)
第二章 投师康门	(2635)
第三章 初涉政坛	(2639)
第四章 戊戌变法	(2643)
第五章 亡命生涯的奋斗	(2648)
第六章 立宪派的主帅	(2655)
第七章 和袁世凯的合作	(2660)
第八章 护国战争	(2670)
第九章 “在野政治家”生涯	(2677)
第十章 逆革命之潮流	(2682)
第十一章 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	(2686)
第十二章 逝 世	(2688)

张 謇	(2689)
第一章 乡村童年	(2691)
第二章 “冷籍”秀才	(2693)
第三章 游幕江宁	(2695)
第四章 投入庆军	(2697)
第五章 初识袁世凯	(2699)
第六章 《朝鲜善后六策》	(2701)
第七章 科举蹉跎	(2703)
第八章 大魁天下	(2705)
第九章 弃官从商	(2708)
第十章 在维新变法的浪潮中	(2710)
第十一章 策划东南互保	(2712)
第十二章 新政先锋	(2713)
第十三章 投身宪政	(2717)
第十四章 服膺共和	(2723)
第十五章 反对“二次革命”	(2727)
第十六章 与袁世凯决裂	(2729)
第十七章 内外交困的大生集团	(2731)
第十八章 苦闷晚年	(2733)
秋 瑾	(2737)
第一章 书香门第生出傲雪寒梅	(2739)
第二章 婚姻不幸渐酿抗争之心	(2742)
第三章 脱离樊笼准备东渡留学	(2749)
第四章 加入革命初现巾帼本色	(2753)
第五章 回国办报唤醒同胞姊妹	(2764)
第六章 主持学堂暗欲改换乾坤	(2779)
第七章 大事不成甘留万古英魂	(2793)
梁漱溟	(2803)
第一章 特立独行的少年	(2805)
第二章 潜心成佛	(2810)
第三章 开新儒家之先河	(2812)
第四章 路漫漫而上下求索	(2815)
第五章 开乡治立国之新路	(2818)
第六章 投身抗战	(2822)
第七章 致力于民主	(2827)
第八章 退隐桂林	(2832)

第九章 内战与和平	(2836)
第十章 只发言，不行动	(2848)
第十一章 获得新生	(2852)
第十二章 横眉冷对千夫指	(2859)
第十三章 第二个春天	(2863)
鲁 迅	(2865)
第一章 伟人的诞生	(2867)
第二章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2868)
第三章 初尝人世辛酸	(2875)
第四章 东渡扶桑	(2879)
第五章 黑暗中的苦心摸索	(2888)
第六章 打破沉默，领导新文化	(2892)
第七章 光辉的十年	(2913)
石评梅	(2921)
第一章 无忧少女	(2923)
第二章 初恋受挫	(2925)
第三章 生死之恋	(2932)
第四章 香消魂散	(2967)
沈从文	(2977)
第一章 自然之子	(2979)
第二章 在铁与血中	(2985)
第三章 索解人生的方程式	(2998)
第四章 在困境中崛起	(3008)
第五章 风雨一扁舟	(3017)
第六章 生命的第二乐章	(3026)

中华名人传记

李鸿章

第一章 一心走仕途的青少年时代

耕读世家

李鸿章，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1823年2月15日（清道光三年）生于安徽合肥东乡大兴集一个世代“耕读之家”。

李鸿章先世本姓许，自江右湖口迁至合肥。合肥位于长江、淮河之间，在美丽富饶的巢湖北岸，属于巢湖盆地，土地广沃，塘水停注，旱涝保收，“民物殷富，俗尚勤俭而崇节义”。李鸿章八世祖许迎溪与同庄李心庄既是姻亲又是好友，心庄无子，请求收养迎溪次子慎所为嗣，迎溪欣然应允，慎所的子孙便改袭了李姓。因而李门祖规为：“许李二姓不准通婚，而与族外之李姓通婚则不禁止。”跟中国一般传统的中上农民家庭差不多，李氏世代以“耕读”为业。李鸿章的高祖父李士俊，由于“处家恭俭”，从最初“清贫无田”发展到后来拥有200余亩土地。但因李家有钱无势，缺少政治靠山，所以时常受到人家欺凌。李鸿章的曾祖父李椿，字凤益，处事“不畏强御，申辩得直”，从而逐渐改变了李家受人欺凌的状况。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在两次参加省里组织的举人考试不中后，退居乡间课率子孙耕读，足迹不出家乡几乎达50年之久。李殿华虽然凭借祖先余荫，继承了一部分土地财产，但因李氏宗族繁衍众多，家大业不算大，所以他能够分得的财产为数不多。所以在现存文献中，往往有殿华役使佃户、雇工和家境贫困的似相牴牾的记载。其子追忆说：“凡田亩近坟冢，春耕（其父）必督佃户雇工坟旁多留隙地，无主者亦培土于其冢，使无倾塌。”殿华可能是个小地主，在封建社会中，这种小地主家庭是典型的所谓“耕读之家”。李殿华生有四子，依次为文煜、文瑜、文球、文安。家庭人口众多，经济负担沉重，但李殿华坚持“耕读”之家的根本，一刻也不放松对子弟的督教课读。李鸿章父亲李文安，字式和，号玉泉，生于1802年。李文安启蒙后，与其兄一同由父亲亲自督课，每当作文写成之后，父亲必先加以详细审阅，指出其中需改进地方。由于李文安少时多病，天资“中下”，所以其父让他随长兄李文煜读书。在长兄的严格督教之下，其专心攻读，初步奠定了做学问的根基。自1822年起，李文安一面继续刻苦攻读，一面设馆授徒。从1825年开始，数次参加江南乡试，多次名落孙山后，终于在1834年考中举人，4年后又成了戊戌科进士，朝考入选，分发刑部任职，后官至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在封建社会，“权”能转化为“钱”，政治上得势，同经济上致富是密不可分的。从此，一向以“力田习武”为业的合肥李氏宗族，由于李文安“以科甲奋起”，一跃而成了庐州一带的望族。李鸿章母亲李氏，是合肥李洪漠的女儿，“秉性淑慎，教子义方”，堪称封建士

人的贤妻良母。她生有6男2女，经济负担比较沉重，但她克服种种困难，勤劳节俭，“尺布寸缕，拮据经营”。有人担心她家人口众多，生活艰难，而她却坦然以对，声称：“吾教诸子发愤读书，皆巍巍有立，岂忧贫哉！”她克服经济上的种种困难，让诸子“发愤读书”，她唯一目的就是想方设法为几个儿子创造条件，让他们朝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拼搏。李文安有6个儿子2个女儿，李鸿章在兄弟间排行第二：长兄翰章，三弟鹤章，四弟蕴章，五弟凤章，六弟昭庆。

总之，李鸿章就出生于这样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家庭经济状况、政治地位、文化素质等诸多因素，都在其身上留下了深深印记，使他在对生活道路的选择上也深深打上了家庭的烙印。首先，这个家庭属于官僚地主阶级，但经济状况拮据，促使李鸿章知道生活艰辛，刻苦自励，锐意奋发向上；这个家庭政治权势不大，具有较为强烈的提高家庭政治、经济地位的愿望，促使李鸿章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其次，这个家庭推崇儒家伦理道德和“学而优则仕”思想，希望子孙“策远志”“出风尘”，成为清朝统治阶级的忠诚卫士。这种特定的家庭环境和条件，推动着青少年时代的李鸿章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传统的封建士大夫人生模式迈出一步一步，并对他终生处世为人、服官治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也决定了他的基本人生志趣和归宿。

少年科第

李鸿章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世，清王朝面临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之时。社会环境的熏陶，家庭出身的影响，封建思想的束缚，使这个时候的李鸿章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

李鸿章6岁开始在家馆中学习，李文安既是他的严父又是他的良师。1834年，当父亲到费氏墨庄就馆时，12岁的鸿章也陪同前往攻读。1835年、1836年、1838年这3年因其父继续赴京会考，没时间再当教书先生，李鸿章便拜堂伯父李仿仙为师。此外，李鸿章还曾受教于徐明经。在包括父亲在内的3位先生的严格督导和学问的陶冶之下，李鸿章在初涉义理和经世致用之学尤其是应付科举考试的制艺技巧方面进步很快，18岁时考入县学成为秀才。此时的李鸿章，才华初露，心气高傲，自信心强。决意克服“因循”积习，珍惜美好的青春年华，再接再厉，刻苦攻读，要作那西汉终军、贾谊式的年轻时就扬名于世的人物。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国子监学习的优贡生。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李鸿章入京，准备参加第二年的举人考试。抵达京城后，李鸿章先住安徽会馆，后又移居狮子胡同马文虎家。在京城，他心志专一，并未被京城繁华富贵的情景所吸引。为了学业的长进，他在不久之后，便以子侄辈的礼节拜见了在翰林院供职的曾国藩。自此，在曾国藩指导之下学习经学和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技巧，成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和思想、事业上的继承人。1844年，李鸿章应顺天恩科乡试，“三场文墨，差堪自满”，结果中试第48名举人。随后，由曾国藩推荐到时任翰林的学士何仲高处，一面教授何公子读书，一面准备参加会试。当时北京组织了一个文社，曾国藩担任社长。李鸿章通过这个文社，既与各地人士交游问学，又常常得到曾国藩在诗文方面的精心指教。1845

年，他参加恩科会试不中，但其诗文却博得了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官的曾国藩的刮目相看。在往后两年时间里，李鸿章在发愤攻读经史、以“求义理经世致用之学”的同时，又着意“习制科举之文”。1847年，李鸿章再次参加会试，中2甲第13名进士，朝考后被点了翰林，以翰林院庶吉士供职京师。寒窗苦读十数载，终于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并且当上了有利于做学问的京官，这对于李鸿章和他的家人来说，都是一件称心如意的快事。3年期满，李鸿章在1850年庶吉士散馆时，以成绩优异而被改授翰林院编修。1851年起，又累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中央一级研究机关的高级研究人员。

做翰林、纂修等官，既清闲又能接触到宫廷内的大量珍贵藏书。李鸿章利用职务之便，潜心经史之学，曾写成《通鉴》一书，并以亲身体会谆谆教导他的弟弟和子侄辈。与此同时，李鸿章也很喜好时艺文字。但与他的老师一样反对雕章琢句、内容空泛的文风，而对以委曲婉转、平易流畅著称于世的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古文这种文体赞赏不已。他把这两种文体比喻为“出水芙蓉”和“苍松翠柏”。他说：“出水芙蓉，光华夺目，曾几何时，无复当初颜色。苍松翠柏，视似平常，而百年不谢也。”他特别推崇唐代韩愈的《论佛骨表》和北宋苏轼的《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这两篇文章。他又指出：“《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经》这6部儒家经典都是记载传递儒家思想体系的书籍，后人对之加以遵循阐发，为文虽因时势不同而有文体上变更，但在宣扬封建的伦理纲常、孔孟之道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总之，文学是为“道”服务的，是“道”的载体，文以载道，这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桐城派创造人方苞就说过：“作文如果不是阐发儒家思想道德，那么有关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等风尚的文章就不要勉强去作。”此外，由于李鸿章生长在桐城派文论的故乡，且其历任老师如父亲李文安、业师徐明经、伯父李仿仙及座师曾国藩等人，都是桐城派文论的传人，所以他在思想上受其影响也就很自然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出生于耕读世家的李鸿章在青少年时期走的是一条读书做官的道路，也就是说走的是一条中国封建社会一般士子的正统之路：即穷经、守道，用封建的伦理纲常来规范自己，育化自己；用儒家的经典和程朱理学的理论来武装自己，充实自己；用“立功”、“立德”、“立言”的人生追求目标来督促自己，鞭策自己；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来约束自己，激奋自己。这样，就决定了李鸿章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死力维护，对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的血性忠诚。



第二章 投笔从戎——镇压农民起义

帮办安徽团练

多年寒窗苦读，终于当上令人景仰的翰林院编修的李鸿章，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展望未来，前程似锦，原以为仕途之路是一条传统、稳妥之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社会如何嬗递，朝代如何更迭，走这条路都没有风险。他可以设法接近皇帝，攀附权贵，沿着这条传统升官之路走下去。怎奈“生于末世运偏消”，一场突发的社会震荡使李鸿章不得不儒生充军旅，投笔从戎。

李鸿章在京师供职期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再加上旧的封建压迫，已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广东、广西、湖南一带，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荡尤为剧烈。1851年1月终于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爆发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农民大起义。1852年，太平军打出广西，进入湖南。1853年1月，一举攻克武汉三镇。2月，全军顺江东下，水陆并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席卷东南。3月，攻占东南第一重镇南京，随即建都于此，改南京为天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封建政权相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随着太平天国的蓬勃发展，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边疆各族人民纷纷举起义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清高潮。太平天国的兴起和全国范围的反清狂飙，使得大清王朝处于极度的风雨飘摇之中。于是，竭尽全力镇压农民起义，稳住清王朝反动统治，成为19世纪50至60年代官僚士大夫政治生涯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

当时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不断颁发诏书，责令各地“勤王”。无奈八旗和绿营兵因长期养尊处优，不堪一击，“文武以避贼为固然，士卒以逃死为长策”。在这种情况下，咸丰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清王朝卖命。另一方面极力动员各地汉族地主豪绅凭借其在本乡本地的封建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并在南北众多省份任命了一大批在籍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李鸿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奉旨离开京师，回原籍办理团练，从而走上镇压农民起义的道路。

1853年3月，刑部左侍郎吕贤基奉命回安徽原籍任团练大臣，他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为由上奏请李鸿章一同回乡，协助办理团练事务。当时阶级搏斗的急风暴雨，不时飘入李鸿章办事衙门的高墙之内，撞入他那沉静安谧的书斋，震撼着他那悠闲自在的心灵。而封建纲常伦理大乱至极的严酷现实，又促使他本能地认识到清政府是地主阶级的惟

一政治代表，同他本人和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于是地主阶级的立场和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驱使作为年轻新进之士的李鸿章遵照清廷意旨，毅然离别翰苑，返回家乡去直接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的军旅生涯。不久，他便随同吕贤基星夜就道，奔赴安徽，从此开始了“宛转随人盖九年”的坎坷历程。

当时的安徽是阶级斗争异常尖锐激烈的地区之一：外有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国的威逼，内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的以捻党为主体的群众反抗斗争。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地主士绅们纷纷举办团练，站到反对农民斗争的最前线。其中以凶悍著名的有：桐城马三俊、吴长庆父子；合肥张树声、张树栅兄弟，周盛传、周盛波兄弟等等。团练头子们各处筑圩练团，自称圩主，互不统属，彼此矛盾斗争极为突出，有的练团甚至草菅人命，抢夺民财，焚掠村庄，无异土匪。满怀信心从京城回到庐州的李鸿章，面对这样内外交困的局面，忧郁之情顿生。他虽然血气方刚，年轻得志，有意大显身手，力挽狂澜，大干一番事业，但无奈自己无权、无兵、无饷，又系儒生从戎，对军事一窍不通，于是他怀着无可奈何的心境，先入署理安徽巡抚周天爵之幕。这时，太平天国忙于巩固南京外围阵地，尚未派兵北伐、西征。而安徽境内的捻军却一跃而起，成为当地抗清的主力。奉命“专司防剿”的周天爵，便把“剿办”皖北捻军、防止其与太平军的联合放在首位。追随周天爵的李鸿章，也自觉地把刀锋指向了皖北捻军。李鸿章随同周天爵主要参与了两次较大的绞杀捻军的战役。一次是兴兵进“剿”定远陆遐龄起义。此次进剿胜利后，李鸿章因功被周天爵奏请清廷赏六品衔。另一次是镇压多达4000余人，活跃于颍州、蒙城、亳州交界地区的陈学曾、纪黑壮起义。这期间，李鸿章尚未与太平军交战，只在本境依靠地主团练镇压势力不很强大的小股捻军，并且他只起了出谋划策的作用。

1853年5月初，安徽巡抚李嘉端行抵庐州，不久李鸿章就从周天爵处调到李的幕府协办团练。此时，太平军已开始北伐之战。北伐军自5月8日从扬州出发首先进入安徽境内，16日占领滁州，18日攻克临淮关，直逼凤阳。面对北伐军的凌厉攻势，李嘉端胆颤心惊，寝食难安，为了保住乌纱帽，只得作出军事部署：一面奏请朝廷速调江西、湖北等省官兵赶赴庐州救围；一面表示要“号召兵勇亲援凤阳”。本部具体军事行动分为3路：一路派候补直隶州知州李登洲率勇300名为先行；一路派户部主事王正谊于梁园镇会合李鸿章，“号召练勇，借助军饷”，前往凤阳进发；一路由他自己带兵200余名后续前进。然而，就在3路队伍刚刚行动之际，太平军北伐部队于5月28日一举攻占凤阳城，紧接着胡以晃等人率领的太平军西征军又长驱直入安徽境内。6月10日，北伐军和西征军分别占领亳州和安庆，李嘉端等人陷入了两路牵制、腹背受敌的危境。此后一连4个月，西征军采取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为北伐军解除后顾之忧而深入华北腹地提供了军事、政治条件，李嘉端为了阻止西征军北上夺取庐州，急忙派遣张印塘、李鸿章分别带领团勇驻守集贤关和运漕、东关一带。李鸿章负责驻防的运漕和东关，既是巢湖一带和庐州重要门户，又是漕粮的集散地和运输通道。西征军为了取得粮食以接济安庆和南京，进占运漕，迫使李鸿章带勇退防东关。此次战役，由于西征军意在取得粮饷以接济安庆和南京，未能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李鸿章也就未遭灭顶之灾，受到了李嘉端奉赏的六品蓝翎顶戴的嘉奖。

就在李嘉端为李鸿章请功后不久，石达开奉命到达安庆，主持西征战事。石达开在皖北改守为攻，派兵进取集贤关、桐城，清兵勇望风而溃，吕贤基成了光杆司令。11月胡

以晃督师攻占舒城，吕贤基走投无路，投水身死。李鸿章只得率所部团勇退守合肥冈子集。12月胡以晃挥师直取庐州。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固守庐州待援。江忠源与李鸿章彼此不熟，曾国藩从中撮合，分别致书他们，希望他们彼此配合，相互救援，共挽狂澜。由于江忠源抵达庐州两天后即被围困于孤城，李鸿章本想救江氏于庐州，但力不从心。援助庐州的各路兵马抵达庐州城外，但因将相间不和，庐州终于在1854年1月被太平军占领，江忠源被迫投水自尽，李鸿章也只好率所部团勇北撤。

庐州为太平军占领之后，清廷改派福济继任安徽巡抚，令其会同另一满族将领和春等力挽皖北危局。由于师生关系，李鸿章被召入幕，所部团勇也归福济辖制。庐州地近南京，为敌对双方必争之地。清廷命福济尽快收复此地，以挽回皖省危局。但由于太平军的奋力固守，多次主动出击，致使清军连连受挫，一时无力收复庐州。在这关键时刻，李鸿章以幕僚的身份出谋划策，建议改变攻庐州的作法，采取先攻东南含山、巢县，再进西南舒城的战略，以阻断太平军援军和粮饷之路。与此同时，福济允准李鸿章率兵勇向含山进发，并夺占了含山、巢县两城。1855年8月，李鸿章进逼庐州，因驰援庐州的太平军石达开部为湖北战事所迫，不得不回师援鄂，李鸿章、福济等部兵勇于11月占领庐州。李鸿章由于此次胜利，博得了善用兵打仗的名声。巡抚福济立即奏请朝廷授予李鸿章福建延津邵道道员的官衔，并赏顶戴花翎。

收复庐州之后，福济又兵分两路，西南直指舒城、三河、庐江等地；东南进犯巢县、和州、东关等地。李鸿章奉命参与东南作战，但屡遭失败。加之封建官场中的互相倾轧、妒忌，使李鸿章在福济幕府中不得其志，颇受冷遇，但他牢记其父临终前嘱咐，决心忍辱负重，咬牙立志与太平军为敌。

1856年4月至6月，太平军分别摧毁了清军江南和江北大营，乘胜对安徽省境内展开强大军事攻势。清军望风而逃，一触即溃。李鸿章年少气盛，依然想主动出击，大举反攻，夺回失去的城池。他率军出战，结果大败而归。是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元气大伤，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1857年2月，太平军后起之秀陈玉成、李秀成协同作战，在安徽北部发动了防御中的攻势，连克桐城、舒城等地。李鸿章所部团勇被击溃，他只好带家人仓皇北逃。1858年7月，福济被免职，由翁同书继任安徽巡抚督办军务。8月，陈玉成部攻占庐州，将李鸿章祖宅“焚毁一空”。李鸿章带母亲及几个弟弟逃往江苏境内镇江。至此，李鸿章结束了他的办理团练生涯。

李鸿章回籍督办团练，历时5年有余，战场受挫，仕途维艰，“昨梦封侯今已非”。就其客观原因：一是安徽反清形势高涨，捻军和太平军遥相呼应，使清军及团练陷于四面受敌的困境；二是各任安徽巡抚和将帅大员懦弱无能，多为庸庸者流，使李鸿章得不到有力扶持和启迪，“茫无指归”，并饱尝了封建官场中互相倾轧之苦。从主观方面讲，李鸿章儒生从戎，手中无兵无权，既缺少经验又少军事知识，“好猛进”、“浪战”，只能“号召练勇，劝借军饷”，而此中又困难重重。然而，这5年多的帮办团练生涯，却给他后来独当一面与太平军为敌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军政素质基础。

投靠曾国藩、编练淮军

1. 投湘军幕府

1859年1月因团练失败而潦倒失意、怀着悲凉心情自称“书剑飘零旧酒徒”的李鸿章，又受到命运之神的惠顾，他的老师曾国藩着意拉了他一把，使他从一个潦倒失意客一跃而成为湘系首脑的幕宾，从此他的宦海生涯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1853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受命帮办湖南团练事宜，他看出“兵伍不精”是清王朝的大患之一，决心独树一帜，改弦更张，编练一支新式武装，以挽救清朝统治。1854年2月，曾国藩正式编成湘军水陆两军，沿湘江北上抗拒太平军。他采取传统的“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先清两湖，稳定后方，继而把军锋指向江西和安徽。1858年7月和8月间，曾国藩先后分兵驰赴浙江、福建，进击因“天京内讧”而分裂出走，放弃江西根据地、盘旋于浙闽的太平军主力之一的石达开部。10月，曾国藩亲率所部抵达江西建昌，尚未入福建，石达开部就采取战略转移，由闽入赣，转入湖南。从而江南军情渐松，而江北却风云突变。面对江南、江北大营进逼天京，湘军围攻安庆、三河，威逼庐州的严峻形势，太平天国后期优秀将领陈玉成、李秀成联合作战，首先摧毁江北大营，解除天京北面威胁，继而在安徽三河全歼李续宾所部湘军精锐6000余人，击毙李续宾和曾国藩胞弟曾国华以及文武官员400多人。包围安庆的湘军，见势不妙，慌忙逃跑，安庆之围不战而解。在这种危急形势之下，曾国藩决定移师援皖。

此时的曾国藩大营人才甚多，但在这军情紧急，“大局糜烂”之际，他仍千方百计网罗“才志之士”。李鸿章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赶到建昌拜访曾国藩的。1859年1月，李鸿章通过当时正在曾国藩大营负责粮台事务、深得曾国藩器重的哥哥李瀚章的推荐赶到建昌拜见了曾国藩。从此以后，李鸿章留在曾国藩幕府中，“初掌书记，继则负责向朝廷拟订奏稿”。李鸿章素有才气，他没有辜负曾国藩的重托，凡所批阅的公文、起草的书牍和奏折等都深受曾国藩的赏识。曾国藩常常向别人夸李鸿章：“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拟文稿都远远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当然，曾国藩虽对李鸿章大为赏识，但对他身上存在的毛病却从不宽待。李鸿章自恃有才，贪睡懒散，日常生活也无规律，因此，曾国藩有意要对他进行训导磨炼一番，以使他变得老成世故起来。曾国藩日常起居颇有规律而富生趣，每天起早查营，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后才开始。他认为这样做既有纪律的约束，又有道德的说教。而李鸿章对于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深以为苦。有一天早上，他假装头疼，没有按时起床。曾国藩接二连三派人催他起床，说一定要等齐人才吃饭，李鸿章见势不妙，披衣“踉跄而往”。他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吃饭。吃饭时曾国藩一言不发，饭后却板着脸对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幕下，我有话告诉你，我这里所崇尚的仅有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李鸿章从未领受过当众被严词训斥的滋味，心中受到极大震动。从此逐渐养成了“每日起居饮食均有规律”的习惯，并在曾国藩面前处处小心谨慎，逐渐变得老成起来。

李鸿章到建昌不足十天，曾国藩就决定由他主持增练皖北马队，隶附于湘军，用两淮之特长，补湘军之不足。李鸿章受命，随即遣人至颖、亳一带招募马勇 500 名。但颖、亳地方绅士，借口团练保卫乡里，对往招之人百般阻拦，所以两淮马队之议，没有实行。1859 年 4 月中旬，太平军回师江西，为了援助张运兰，保住景德镇据点，6 月曾国藩急调曾国荃所部湘军 5000 多人，从抚州进兵景德镇，曾国藩即命李鸿章前往协助军务。但李鸿章不愿寄人篱下，想推却，而曾国藩又知他“文武兼资”，于是具折向朝廷奏明，留李鸿章在营襄办军务，自此李鸿章成为湘军正式成员。数日后，曾国藩致书李鸿章，要他担当重任，以图报效君恩，无奈，李鸿章只得前往曾国荃处协助。7 月 13 日，李鸿章随曾国荃攻陷景德镇。14 日，进占浮梁县，胜利回归抚州。11 月，清廷授予李鸿章福建汀漳道遗缺，曾国藩考虑正是用人之际，随即奏留李鸿章继续留任幕僚，担任文案工作，并参赞军务。

1860 年 5 月，太平军第二次摧毁清军江南大营，清朝的正规军队绿营兵已崩溃。咸丰皇帝环顾左右，只有依靠湘军镇压太平军。于是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统归其管辖。这时候，李鸿章随曾国藩驻师祁门，经营皖南。李鸿章鉴于祁门地势偏僻，建议曾国藩留待皖南部署稍定，即应亲往淮扬一带兴办水师。湘军二号统帅胡林翼完全赞同李鸿章主张，曾 7 次函请曾国藩经营淮扬，并极力推荐李鸿章。8 月 19 日，曾国藩决定采纳胡、李二人意见，奏保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曾国藩决定兴办淮扬水师，原计划利用淮徐等处风气刚劲，在淮扬兴办船厂，招募两淮之勇，以弥补湘军的不足。为此，他命令李鸿章先到淮扬，初步组建，明年他再亲自前往组建。1861 年 6 月，淮扬水师正式宣告成立。在创办淮扬水师期间，李鸿章曾因李元度失徽州向曾国藩求情，但曾国藩未允许，依然严惩了李元度，李鸿章一怒之下愤然离开曾国藩幕府，回到南昌他哥哥家中闲住了一年之久。后因胡林翼说和，再加上李鸿章恋师生之情，曾国藩大度，亲自致信请李鸿章回营，李鸿章于 1861 年 7 月 13 日从南昌驰赴安庆，重新回到曾国藩幕府，使得曾国藩手中又多了一位得力助手。从此以后，李鸿章忠心师事曾国藩，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下，在个人修养及政治上都得到了曾国藩的着意栽培和极尽熏陶。

2. 编练淮军

古人云：“时势造英雄。”重返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虽算不上什么英雄，但是急剧变化的时势却为他实现梦寐以求的掌握军权，独树一帜的野心提供了良机。

1861 年 8 月，咸丰皇帝病逝于热河，6 岁的载淳即位，以载垣、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五大臣。11 月，载淳生母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一起发动了宫廷政变，杀害和罢免五大臣，从而夺取了清朝最高统治权。慈禧宣布垂帘听政，任命恭亲王奕訢为执政王，负责主持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慈禧、奕訢为迅速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维护清朝统治，继续依靠汉族地主武装，任命曾国藩统辖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并节制自巡抚、提镇以下各员。

1861 年 9 月 5 日，曾国荃所部湘军攻陷安庆，李鸿章随同曾国藩自东流进驻该城，朝夕会商进军金陵和进攻太平军的计划。当时的军事态势，江苏、浙江的大部分地区仍为太平军所有，湘军要进攻金陵，非有大支劲旅分别进驻苏、浙不可，但湘军力量是显然不足的。所以为补湘军力量不足，利用两淮风气刚劲，编练淮勇，是曾国藩酝酿已久之事。恰

好这时，太平军在“合取湖北、保卫安庆”的战役失利后，采取西线防御、东线进攻的战略，击溃东线清军，进克浙东、浙西大部分地区，直捣杭州，威逼上海。上海当时是全国最大商业城市和中外反革命势力汇聚之地。上海官绅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惶惶不可终日，一面倡议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建立中外会防局；一面通过湖北盐道顾文彬向江苏巡抚薛焕、团练大臣庞钟璐建议，请求派人立即赴安徽向曾国藩求援。所以，弥补湘军力量的不足，上海绅士的乞师，促成了淮军的编练。

1861年11月8日，由上海道吴煦筹银20万两，雇佣外国轮船，派遣主事钱鼎铭和知县厉学潮等人以苏浙乡绅名义到安庆向曾国藩求援。但曾国藩顾虑上海同安徽“地处遥远，一旦有紧急事发生，不能相通”，而手下又无多余兵力，于是并未应允援助上海。钱鼎铭探知李鸿章是曾国藩亲信幕僚，深得宠信，于是便亲自登门拜访，请求他帮助劝说曾国藩。李鸿章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多方劝说曾国藩立即派兵助守上海。同时清政府接受大学士、常熟人翁心存的上疏，颁发谕旨命曾国藩速遣大将东下江南，以慰“乡民”之望。至此上有朝廷谕旨，下有江、浙、沪官绅的坚请，再加上曾国藩认真考虑了当时局势，以为湘军正从西线顺江东下，威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分兵援沪，“由下捣上”，就可以造成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形成分进合击之势，逼迫太平军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曾国藩终于痛下决心拨兵援沪。主意打定之后，曾国藩对领兵援沪的人选问题，作了周密安排。起初，决定派其弟曾国荃前往，进而，他又改派曾国荃为主帅，辅之以李鸿章、黄翼升。但是此时曾国荃心志不在于援沪，而在南京。于是他12月31日写信给曾国藩拒绝援沪，这样，曾国藩不得不派李鸿章、黄翼升先行救援上海。这种变化，为李鸿章创立淮军，掌握兵权、控制饷源重地上海、登上江苏巡抚宝座开辟了道路。因为此时李鸿章手中无可以直接控制和指挥的一兵一卒，而曾国藩的湘军因全力防“剿”各地太平军，没有充分的兵力可供调拨。于是，曾国藩于1861年12月让李鸿章先行回安徽招募淮勇，用以组建援沪之师。李鸿章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军事条件下着手组建继湘军之后晚清另一支地主军阀武装——淮军。这也标志着李鸿章政治生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李鸿章奉招募淮勇之命后，回到安徽老家，考虑到“徒党星散”，“立时募练”困难重重，而庐州一带旧有团练较为强悍，自己对当地人情也较为熟悉，所以决定罗致并改编庐州一带旧有团练，组建淮军。他没有返归故里，而是坐镇安庆，通过派人或通信积极与淮南各地团练头目进行联络：一是通过其父文安旧部张树声联络合肥西乡民团头目刘铭传及周盛波、周盛传兄弟；二是通过其门生潘鼎新联络庐江官团头目吴长庆等；三是派人联络其在合肥办团练时的旧部张桂芬、张志邦、李胜、吴毓芬等；四是令其弟李鹤章、李昭庆回乡利用乡族关系募集亲兵。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正式组成一支5000多人的军队，当时叫淮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淮军。

这支淮军由“鼎”字营（营长潘鼎新）、“铭”字营（营长刘铭传）、“树”字营（营长为张树声）、“庆”字营（营长为吴长庆）、“春”字营（营长为张遇春）五个营组成。1862年2月下旬，李鸿章所招募的淮勇陆续抵达安庆北门城外驻扎，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于是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根据李鸿章的请求和淮勇实际情况，曾国藩决定从湘军中陆续调拨8个营归李鸿章统一节制。这其中有曾国藩的亲兵两营，由韩正国统带，充作李鸿章的亲兵；有曾国荃的“开”字两营，由程学启统带；有滕嗣林、滕嗣武统带的“林”字两营；有由陈飞熊统带的“熊”